

【文学艺术】

# 鲁迅“散兵战”战术的智慧

竹潜民

(宁波高等专科学校 秘书系,浙江 宁波 315016)

**摘要:** 鲁迅晚年曾提出“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的战术,对于“堑壕战”、“持久战”,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而“散兵战”,却较少论述。鲁迅“散兵战”战术具有独特的价值,是鲁迅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散兵战”战术的三个特点是:一是避免过多的、明显的政治色彩;二是减少集团性攻击;三是坚持以笔作武器。

**关键词:** 鲁迅;战术;智慧;散兵战

中图分类号: I210.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2)01-0047-05

## Lu Xun's Wisdom in His Troop-scattering Tactics

ZHU Qian-min

(Department of Secretary, Ningbo College, Ningbo 315016, China)

**Abstract** In his late life, Lu Xun mentioned his tactics scattering the troops, digging trenches and prolonging the war.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have always received attention while in contrast the first one has rarely been talked about. Lu Xun's troop scattering tactics has its unique value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u Xun's talent.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avoidance of political coloring, reduction of attack against blocs and utilization of pen as a weapon.

**Key words** Lu Xun; tactics; wisdom; scattered troop war

鲁迅的智慧是说不尽的。随意地翻阅《鲁迅全集》,处处既可见诗人的激情,更可见哲人的睿智,在书信和日记中也比比皆是。例如1935年10月4日在给萧军的信中,开始谈了文坛中的一些混乱状况,接着表示:“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然后,他提出了“三战”的主张:“……德国腓立大帝的‘密集突击’,那时是会打胜仗的,不过用于现在,却不相宜,所以我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不过我是步兵,和你炮兵的法子也许不见得一致”<sup>[1]</sup>。

此话看似信手拈来、随口而说的,实际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战斗经验和战略战术的总结。其中的堑壕战、持久战战术,早已为论家所重视。瞿秋白归纳的四点鲁迅精神,其中第二点即是“韧”的战斗,“打仗就要象个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结实的立定自己的脚跟,躲在壕沟里,沉着的作战,一步步

的前进,——这是鲁迅所谓‘壕堑战’的战术”<sup>[2]</sup>。周恩来1941年在纪念郭沫若创作25周年时发表的讲话中曾概括了郭沫若的三个特点: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同时将鲁迅和郭沫若作了比较,指出:“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sup>[3]</sup>。由此,足见鲁迅先生的“堑壕战、持久战”战术影响之大。

但是,鲁迅自述的“散兵战”,却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是最能反映先生特有风格的,很有研究的必要。这里涉及到鲁迅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对此人们一般没有什么争议;而对于革命家的问题,历来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如台湾的苏雪林、郑学稼等人就明确反对鲁迅是革命家,并提出疑问:如果鲁迅是革命家,那么他为什么会“心平气和”地在北洋政府做了14年的小官

僚?为什么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会领取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津贴?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如果鲁迅是革命家,那么他为什么基本上不参与重大的政治活动,有时他还反对别人参加这类活动,如“三·一八”那天他就反对许广平出门?为什么鲁迅在30年代会同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格格不入,发生那么多的矛盾?直到近期,葛红兵还在喧嚣一时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中指责鲁迅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sup>[4]</sup>?而王朔借别人的口更是以揶揄的笔调说:“鲁迅,有什么呀!……论骨头硬,他有王二小骨头硬吗?给敌人带路,掩护了几千老乡和干部;被敌人摔死在石头上”<sup>[5]</sup>。《收获》2000年第三期载,90年代初期,东京曾演过一个以鲁迅为主人公的话剧《上海的月亮》,剧作者是井上ひさし,戏中有不少荒诞的成分,其中一个情节是鲁迅向秋瑾的灵魂忏悔,对秋瑾回国革命而自己却没有投身革命活动而深深内疚<sup>[6]</sup>。上述种种,内容和形式略有差别,但实质就是一个:均认为鲁迅谈不上是革命家,也谈不上“骨头硬”。这些疑问从表面看似有些道理。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理解鲁迅,并懂得了鲁迅独有的“散兵战”战术,那么就会看穿其中的荒唐了。我们应当这样认识鲁迅:假如作一个历史的类比,鲁迅不是罗伯斯比尔、马拉一类政治家型的革命家,而是属于卢梭、伏尔泰一类的思想家型的革命家,他同一般的政治家、战略家在思想方法、战斗策略、个人气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如以一般的革命家、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鲁迅,如果将鲁迅同徐锡麟、秋瑾一样看待,甚至要求鲁迅象王二小那样直接在战场上与敌人周旋,那实际上是完全不懂得鲁迅的智慧,简直是同鲁迅太隔膜了。应该说,这个道理似乎只是鲁迅研究中的“常识问题”,但是从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对鲁迅的非议来看,这个“常识问题”并不为有些人所理解,因而还有研究和强调的必要,研究鲁迅“散兵战”战术的价值也就在这里。

鲁迅的“散兵战”,概括来说,即是避免集团性的“密集突击”,发一枪是一枪,以此击中敌人的要害;而这种避免集团性攻击的战术,又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及思维方式,使每一个人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能量,以产生更大的效能。具体说来,这种“散兵战”战术有三个特点。

## 一、避免过多的明显的政治色彩

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如果在自己的

额头上贴上“革命”的标签,实际上对进步事业并无什么好处,只会成为敌人镇压的口实。这是鲁迅从痛苦的历史经验中得出来的教训。1935年底,晚年的鲁迅回忆了辛亥革命前剪辫子的一段经历,他在日本留学时剪掉了辫子,回国后便遭到人们异样的眼光,甚至是冷笑和恶骂,连满洲人的绍兴知府也特别注意他。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却忘了”<sup>[7]</sup>。

从这段话中可以知道,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前就不主张采取剪辫子这种贴标签式的反抗,这种政治色彩过于浓重的反抗形式,只是暴露了自己,成为敌人残酷杀戮的口实。以后鲁迅在坚持思想文化领域冲锋陷阵的同时,在一般情况下都避免明显的政治色彩。正因为如此,他在做小京官的14年间,除了张勋复辟期间“愤而离职”外,其余时间均没有离开过教育部,以此保证了《呐喊》《彷徨》一系列著作的诞生。在民众心目中,前期鲁迅的身份,除了作家外,还是北京、厦门、广州的大学教授;后期在上海10年,其身份也是一位自由撰文的作家,均无明显的政治标签,这对他长期坚持的写作生涯,实际上成了一种保证。

特别值得后人体会的是,在敌我双方斗争白热化之际,为了策略上的需要,鲁迅有时甚至故意显示“无色彩”。对此,许广平是心领神会的,1926年,她在给鲁迅的信中,就透露了公众对鲁迅的评价:“自郭沫若作官后,人皆说他左倾,有些人且目之为共党,这在广州也是排斥人的一个口头禅,与在北京无异。……你是大家认为没有什么色彩的,不妨姑且来作文艺运动”<sup>[8]</sup>。“没有什么色彩”的人来“作文艺运动”,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是一种极好的斗争策略,显示了智者的冷静和成熟。大革命失败后,鲁迅虽然对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极为反感,但他还是利用这种“无色彩”,通过蔡元培先生领取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干薪”,以维持自己的写作和研

究生活,这实在是有利无弊的聪明事。直到30年代,国内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残暴镇压迫使鲁迅公开站到被压制的共产党一边,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才停止发这笔资金。但他在劝慰一些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时,仍然希望他们在公开场合保持“无色彩”。1935年1月4日,鲁迅致木刻家李桦的信中,谈到木刻运动需要一个大的组织,但鲁迅又担忧:“组织一大,猜疑也就来了,所以我想,这组织如果办起来,必须以毫无色彩的人为中心”。信中鲁迅回忆了4年前因举办一个木刻讲习班,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而受到压迫的往事,说:“所以在这里,说起‘木刻’,有时即等于‘革命’或‘反动’,立刻招人疑忌”<sup>[1]</sup>。由此反证了外表保持“无色彩”的必要性。在鲁迅看来,他自己虽遭到“通缉”,但有声望和地位,国际上又有影响,敌人迫害他还有一定的顾虑;而年轻人太稚嫩,死了也无声无息,所以要特别珍惜自己,懂得“生命第一”的含义,不要作无谓的牺牲。这是面对“宁可杀错千人,不可放过一个”的中国反动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的斗争策略。所以,直至逝世前,鲁迅认为如果条件许可还是必须运用这种“无色彩”战术的。

## 二、减少集团性的攻击,避免同反动势力发生不必要的正面冲突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确立了“立人”的人生理想,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不主张盲目的激进行为。历史已经证明,离开生产形式的现代化,离开人的思想意识的觉醒,单纯的政权形式的更迭,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而人的现代化是不可能依靠盲目的激进行为实现的,因而他一贯地不热衷于集团性的攻击行为。他认为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集团性的攻击既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又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实力消耗。人们往往愿意将鲁迅和秋瑾对比,而鲁迅和秋瑾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分歧。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周氏兄弟在东京留学期间,日本政府在中国公使馆的阴谋之下,公布限制留学生的取缔规则,秋瑾为首的一批留学生主张全体归国,以示抗议,而鲁迅、许寿裳等人却不同意,认为无全体归国之必要,结果被秋瑾主持的大会认为是反动,给判处“死刑”。据鲁迅说当时秋瑾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胁。这段秋瑾和鲁迅发生尖锐冲突的革命逸事,意味深长。秋瑾激进主义的革命勇气固然令人钦佩,而鲁迅的持重态度更是令人深思。由此可见,当时他对中国社会积弊的

认识已经比同时期人更深刻、更清醒。鲁迅曾多次讴歌秋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但对秋瑾企图靠暗杀、暴动来改变中国命运的做法,历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很难说鲁迅的看法一定比秋瑾正确,但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仍一天天沉入到黑暗里的事实,却证实了鲁迅的观念:即使是清朝推翻了、政权更迭了也无济于事,靠一次数次集团性的攻击行为是无损于敌对阵营一根毫毛的,倒不如一人一枪的“散兵战”,更能在改变国民性、改造人的灵魂方面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

鲁迅的这种观点和策略一直保持到晚年。如出于对当政者的极端不信任,鲁迅一直反对集体请愿式的反抗,1926年他不主张青年学生到政府门前示威游行;“三·一八”当天反对许广平出门即缘于此;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他又“重申9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sup>[7]</sup>同时,鲁迅的这种“散兵战”战术,还在于他不热衷于参加政治团体,即使参加了某些团体,他也注意独立思考,保留自己的“特立独行”。从现已整理出来的《两地书》原稿上,有一段重要的话,表明了鲁迅对直接参加政治团体的态度。

1925年5月27日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提出一位老同学劝许广平参加一个团体,但许怕参加后受团体的束缚,有些顾虑,便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在同年5月30日答复道:“所云团体,我还未打听,但我想,大概总就是前日所说的一个。其实也无须打听,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果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sup>[9]</sup>。在这里鲁迅强调了思想的“特立独行”,确实,假若一个思想家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又从何而谈思想家呢?鲁迅在1927年10月说:“唐朝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兵操练很勇敢,就有人对着他称赞。他说:‘兵好是好,可是无思想,’这话很不差。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sup>[10]</sup>。这话中虽然不无调侃的成分,但其中也足见鲁迅思想家的气质。正因为如此,鲁迅在晚年迫于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形势,虽然参加了自由大同盟、民权保障会、左翼作家联盟等团体,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仍然坚持独立作战的方式,以至左翼作家中有人认为他只会使用“原始武器”而不会使用“现代武器”<sup>[11]</sup>。同时,他在进步团体内决不盲从,仍然坚持独立思考,对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奴隶总管”、“革命工头”等不良倾向提出了坦率而尖锐的批评,对党内的左倾路线保持了一定的警惕。

性,这成为鲁迅晚年思想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 三、坚持以笔作为武器

鲁迅一贯认为:在总目标一致的前提下,革命进步阵营内部每个人执的业是有区别的,各有不同的分工。1933年,鲁迅在回忆“五四”前后同李大钊的交往时说:“……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sup>[12]</sup>。这里,鲁迅并非是谦虚,也非是掩饰,而是肺腑之言,是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出了自己同职业革命家的区别,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北方区书记、直接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李大钊确实是不同的。鲁迅历来同官场少有搭介,同革命团体的决策层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而始终是以他那支横扫鬼魅世界的笔,投入那唤醒民众的事业的。他多次重复过类似的话:“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sup>[12]</sup>。以至这话一直成为他的人生宗旨,直到逝世,他始终是把书斋作为自己的主战场。

可贵的是,30年代“左翼”文艺的领导人,由于受左倾幼稚病的影响,对鲁迅的这种“以笔作战”的战术是不理解的,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做法。据当时左联一重要负责人周文的回忆,“左联”中普遍流行这样的说法:“鲁迅矛盾的路,是已经过去的路,我们不应该再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只能写写文章,不能作实际工作,我们不必重复他们的路!”周文回忆道:“在整个组织里,真是许多人都把散传单、参加会议行政等等,才当作是唯一的实际工作,而创作之类什么的,多认为是既不‘实际’,也不‘英勇’的事业,不过是‘老’‘作家’们已经‘过去了’的路而已”<sup>[13]</sup>。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坚持自己独特的“散兵战”的作法所受到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了。鲁迅同某些“左联”领导人思想上发生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种战术认识上的分歧。但正如周文这篇1940年就写出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当时在同志们中发生了两种现象:一种是觉得自己是来做文学工作,而不是来散传单,贴壁报之类的,便消极地离去了;一种是觉得‘左联’这种散传单贴壁报之类的工作还不够‘实际’,便转到别的组织活动去了。因此当时的组织工作便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后来,真正纠正了那缺

点,扫除了那苦闷的还是鲁迅先生”。由于鲁迅在左联内一再强调“左”而要“作”,要加强培养新的作家、诗人、理论家,多培养新人,认真创作,努力创作,“左联”才改变了“无实货”的局面,培养并带动了一大批作家,形成了左翼文坛上群星灿烂、佳作迭出的局面。实践证明鲁迅独特的“散兵战”战术是完全正确的。据冯雪峰回忆,直到1936年夏天,鲁迅逝世前夕,当他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明确了抗战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后,还动情地表示要用他独特的方式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sup>[14]</sup>!对这句话的确定性含义,显然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如果将这句话的重点放在“用笔”这一点上,那是完全符合鲁迅本意的。

当然,在革命阵营内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战略战术。对此,鲁迅也不是完全排斥的。在这方面,冯雪峰的《回忆鲁迅》中有一段相当有价值的记录。1936年夏天,冯雪峰同鲁迅的谈话中“无意地谈到他在文章里面多用‘我’,少用‘我们’;我当时以为有时候是用‘我们’来得壮旺些,而在必要的时候他还应该明白地公开地宣布他自己的代表性的地位。就是,代表巨大的势力,代表人民,代表正确的意见和真理的方面”。过了几天,鲁迅就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我一向显得个人作战,又多使用投枪,也仍然是散兵战。在我个人,和进攻的同时,还注意防御。……今后,也可以使用不同的战法的”。接着,冯雪峰作了如下的评议:

“……可以注意的是,这种无意地谈到的问题,竟引起他的思考,并引起他的新的态度。但这当然不是说,在当时的环境,用各种笔名和个人的名义向敌人进行思想和政治的战斗,即用所谓的‘投枪’、‘散兵战’等的战法,是已经过时了,当时鲁迅先生和我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可以集结力量,以压倒的势力压倒敌人的时候,就集结力量去压倒敌人,一就是说,用大炮轰;同时,在必要的时候,一向以个人名义说话的他,是可以和应该作为人民和革命的代表者说话的;而且和旁敲侧击的批判的同时,也可以多使用正面的攻击和多说正面主张的话”<sup>[14]</sup>。

细细体会鲁迅和冯雪峰的这段对话,可以看出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冯雪峰虽然并没有完全否认“投枪”、“散兵战”等的战法,但是他言下之意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也可以换一种战术,即使用“炮兵”的方法。二是冯雪峰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也许更赞同

“炮兵”的战术,认为在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全国人民形成一致抗日高潮形势下,鲁迅应该采用“正面的攻击”战术,应该直接“作为人民和革命的代表者说话”。由于鲁迅一直将冯雪峰当作共产党的代表,对他的意见十分尊重,因而就表示同意了。几乎就在上述谈话的同时,在鲁迅同意的情况下,冯雪峰代鲁迅起草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几篇明确表示政治态度的文章,公开赞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实际上也体现了鲁迅战术的转变。可是,病魔过早地夺去了鲁迅的生命,我们很难预料抗战全面爆发以后鲁迅主要将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但是,鲁迅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在冯雪峰的建议下,他没有固执自己的看法,从这个现象看,鲁迅也是赞同多种多样的战略战术的。

把握了鲁迅“散兵战”战术的特点,那么对鲁迅的种种疑问和诘难也就迎刃而解了。在北洋政府做了 14 年的小官僚,并没有妨害他写出象《狂人日记》《灯下漫笔》这样的战斗檄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领取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津贴,保证了他在没有其它固定收入的情况下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写出了一篇篇声讨旧世界的杂文;假如他像徐锡麟、秋瑾一样,组织反清的武装暴动;像李大钊一样,出现在“三·一八”现场;或像“左联”的年轻人那样,从事所谓“英勇”的“实际工作”,那么鲁迅将成为怎样的呢?可以肯定地说,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实践已经证明:在北洋政府、国民党的统治区内,鲁

迅采用“散兵战”的战术具有独特的价值,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说,是“散兵战”战术的智慧成全了鲁迅,同时也使后人从中得到很多的启发。

#### 参考文献:

- [1] 鲁迅.鲁迅全集(1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6,2.
- [2]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C].文学运动史料选(2).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83.
- [3]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J].新文学史料,(2):4.
- [4] 葛红兵.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J].芙蓉,1999,(6):134.
- [5] 王朔.我和鲁迅[J].收获,2000,(2):130.
- [6] 孙歌.鲁迅脱掉的衣裳[J].收获,2000,(3):96.
- [7] 鲁迅.鲁迅全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1—189,435.
- [8] 鲁迅.鲁迅全集(1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71.
- [9] 王得后.两地书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32.
- [10] 鲁迅.鲁迅全集(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8—189.
- [11] 林贤治.人间鲁迅[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1072.
- [12] 鲁迅.鲁迅全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24—525,62.
- [13] 周文.鲁迅先生和“左联”[J].鲁迅研究月刊,1994,(8):34.